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for 50 Years*

中 国

高等教育研究 50 年
(1949~1999)

总主编 陈学飞

顾 问 汪永铨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责任编辑：韦 禾
封面设计：王四海
责任校对：曲梦瑶 刘永玲 徐 虹
责任印制：尹明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50 年：1949~1999/陈学飞主编.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 10
ISBN 7-5041-1893-1

I. 中… II. 陈… III. 高等教育-教育理论-研究-1949~1999
-文集 IV. 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382 号

出版发行：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 46 号
电 话：62013803 邮编：100088 传真：62012454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北京外文印刷厂印装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16
印 张：126 字数：4800 千
版 本：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 001—3 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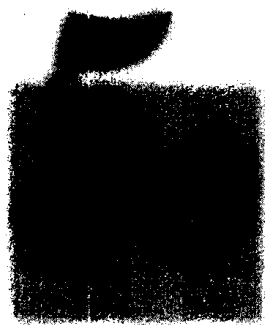
定 价：2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与调换。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总目录

第 1 卷	高等教育原理	(1~234)
第 2 卷	高等学校课程与教学	(235~478)
第 3 卷	高等教育管理	(479~722)
第 4 卷	高等教育经济与财政	(723~1000)
第 5 卷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1001~1232)
第 6 卷	高等学校德育	(1233~1472)
第 7 卷	比较高等教育	(1473~1750)
第 8 卷	中外高等教育史	(1751~2006)
后 记		(2007)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50 年
(1949~1999)

第 1 卷

高等教育原理

主编 喻岳青 陈向明

专家推荐组成员

邓晓春 龚 放 文辅相 周 川 喻岳青



应答实践对理论的呼唤

——高等教育原理研究 50 年回顾

喻岳青

主编命我为他主持编纂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50 年(1949~1999)》一书中的“高等教育原理”分卷写一篇回顾的序文,这对我来说是不胜其任的。原因有二:其一,我本人并未对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做过多少研究工作,更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见解;其二,前后 50 年,特别是“文革”后的 20 余年,发表的教育理论文章也可以说浩如烟海了,而我认真读过的恐只是九牛一毛,管窥蠡测,终乏大观。即勉强为之,终恐疏漏甚多。

对高等教育进行理论探讨,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哪些命题或教育领域的哪些问题属“教育原理”则无定论。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关于高等教育科学的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以笔者浅见,“高等教育原理”应涉及高等教育领域的这样一些基本理论问题:(1)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属性;(2)高等教育价值观(包括高等教育的价值、目的、功能、作用和任务);(3)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关系);(4)高等教育的教育观(包括教育性质、教育目标、教育质量观、教育途径、师生关系等);(5)其他关于高等教育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如高等教育现代化、民主化、终身化、国际化、学术自由等)。收入本卷的文章,基本上是与上述问题有关的有代表性的论述。将这些内容归入“高等教育原理”可能不会引起大的分歧。但是否还有其他一些理论(如教学理论、教育发展规划、教育评价理论等)也可归入“原理”,这是在构建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体系时需要研究和考虑的问题。好在本套丛书共有 8 卷,并作了大致的内容划分,本分卷没有收入的某些理论研究,可在其他分卷中看到。

下面对“高等教育原理”研究的 50 年回顾,将只围绕本分卷涉及的内容作简略的概述。

一、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发展的背景与状况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我国始于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其标志是厦门大学(1978)和北京大学(1980)先后建立高等教育研究室。1982 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准两校成立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其后,在我国许多高等学校中都纷纷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并逐渐形成了一支高等教育的研究队伍。1983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并出版了学会刊物《中国高教研究》。80 年代中期以后,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高等学校出版的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公开或内部刊物如雨后春笋,至 90 年代初发展到 700 余种,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广泛而深入地开展。1993 年在潘懋元先生的倡导下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二级分会),其主要宗旨是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它的成立,对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前的 17 年,我国高等教育是在国家高度集中管理的体制下发展的。有关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任务、发展规模、教育模式、培养目标,直至课程和教学内容,都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统一作

出规定,高等学校只是执行。当时政府有关决定的依据,一是要使高等教育适应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各类专门人才;二是在一段时期内照搬苏联的教育经验,认为凡是苏联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出现这种情况,既是由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决定,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在那种情况下,客观上既没有提出对高等教育进行理论研究的要求,也不具备开展理论研究的条件,谈不上真正的理论研究。

其间,就整个教育领域而言,也曾开展过某些重要的教育讨论。如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讨论,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讨论。这些讨论都不能不涉及到高等教育。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的关于“红”、“专”关系的讨论,更主要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开展的。围绕这些讨论提出的问题有:如何正确理解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发展的教育;人的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教育中智育与德育的关系等。当时由于照搬苏联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我国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繁多,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且在“全面发展”的口号下,要求门门5分,更加重了这种负担;由于片面强调教学计划的统一性,而忽视了学生的个别差异,不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有些人批评了把“全面发展”庸俗化为“平均发展”的观点,提出了学生的学习要有重点;批评了只强调统一,而忽视个人自由发展的观点,提出应把“因材施教”列入教育方针。而多数人赞成在教育中应因材施教,但不同意其作为教育方针,认为因材施教只是方法问题。至于50年代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的“红”、“专”大辩论,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占主导的观点是对只重视专业知识学习而忽视政治思想教育的观点进行批判。

在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教育讨论中,还涉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以及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问题,主要是从正面阐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意义,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改造思想的重要性;阐述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对提高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意义。在1958年之后,针对大跃进中由于劳动和科研安排不当冲击了正常教学秩序的问题,大部分人提出高等学校应以教学为主。

综观那一时期的教育讨论,还只停留在对现实问题分析的层面,缺乏理论深度。在阐述各自的观点时,政治论的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没有跳出只是简单地引证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话语或我国政治领导人的观点、对其加以诠释和发挥的窠臼。当然也提出过这样鲜见的观点:“用行政的权威来禁止所谓的异端邪说,独尊某一种学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做法,只会造成学术的停滞,思想的凝固。”(刘佛年,1957)但未引起重视,也未对那一时期的讨论产生实际影响。

“文革”中的10年,是高等教育遭受严重破坏的10年,也是政治论观点占据统治地位的10年。在这一时期,“四人帮”的御用班子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高等学校应如何办”的系列文章,炮制了“高等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高等学校要“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学校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等论点,把教育引向彻底政治化的轨道。与此同时,教育界虽然实际存在着与上述论点相抵的思想和观念,但除了“老老实实”地检查“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之外,已不可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更无探索教育理论的可能。

“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粉碎了“四人帮”加于教育界的“两个估计”的枷锁。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教育理论界获得了极大的思想解放。从此迎来了教育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笔者认为,推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有以下三个。

第一,对我国解放后至“文革”期间教育实际的反思,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高等教育的价值是什么;如何认识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和任务,等等。

第二,我国社会改革开放的现实对高等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课题;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也呼唤理论的指导。高等教育怎样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功能和教育目标应有怎样的发展?新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转变哪些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这些问题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对未来教育发展的前瞻性。

第三,随着我国的开放,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研究成果,纷纷引入国内,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丰富了我们的头脑。突破了过去那种独尊一家的学术樊篱,使中国的教育理论界能够在吸收各国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更广阔的时空视角审视我国的教育,思考建立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体系问题。

应该说,近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令人欣喜的。首先,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队伍迅速壮大,并且发展成为一支专职教育研究人员、政府决策管理干部和广大高校教师相结合的队伍。

伍。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已成长起来,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骨干。其次,对高等教育的理论探讨,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相当的深度,并且注意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第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自1984年出版由潘懋元先生主编的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以来,已相继出版多部高等教育学专著,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已发表有关高等教育理论的文章数以千计,仅本分卷的基本论文目录收录的关于高教基本理论的研究论文就达900余篇,著作230多部。1993年由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发起组织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课题,经过三年的研究,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要点》一书、三本论文集及各子课题出版的论文和专著,构成了该项研究的整体成果。这项成果具有一定代表性,它虽然定位在应用理论研究,但对近年来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也作出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还要一提的是,一批青年学者,锐意进取,在开拓创新的道路上迈出了勇敢的步子。例如由胡建华、陈列、周川、龚放等中青年学者合著的《高等教育学新论》在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上突出了一个“新”字,被潘懋元先生评价为“在‘走向成熟的学科’的峻岩间攀上了一个新台阶”。

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没有止境的,高等教育的理论探索也是没有止境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以大胆创新的良好环境,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将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二、关于若干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概述

要在这篇短文中全面总结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难以办到,仅择其要者概述之。

(一)关于高等教育本质和社会属性的研究

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探讨,就是要回答“教育是什么”这一基本理论问题。

我国现代教育家杨贤江在二三十年代即提出“教育为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50年代苏联关于教育范畴的讨论,作出了“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结论。这一结论为我国所接受,并成为我国关于教育现象的一个基本认识。

70年代末,人们出于对“文革”中教育问题的反思,同时认识到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而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提出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1)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2)教育是社会生产力;(3)教育部分是上层建筑,部分是生产力;(4)教育是“特殊范畴”。

在讨论中,人们发现在概念和范畴的使用上出现了混淆,遂从理论上对“本质”概念的本身进行了辨析,并逐步达到了共识。本质是事物特有的质的规定性,由事物的内在矛盾所构成。本质属性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属性。人们常说的教育具有“上层建筑属性”或“生产力属性”,反映的是教育现象和社会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不是教育所特有的属性,因而不能称为“教育本质”,而应认为是教育的“社会属性”。

进而从分析教育的内在矛盾出发,有人提出“教育是按一定社会要求,有目的地促进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或简言之,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界对教育本质的表述尽管略有差异,但把培养人作为教育的质的规定性则是一致的。根据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有人提出“高等教育是在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的专业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多种社会属性,反映了高等教育和其他各种社会现象或活动的联系或关系。其中比较突出的或基本的属性是“上层建筑属性”和“生产力属性”。从社会生产和劳动交换的关系上分析,高等教育又具有“商品性”和“产业性”。这些属性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于一定的教育形态之中。要正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社会属性的辩证关系,不能孤立地、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

(二)关于高等教育的价值、目的和功能的研究

价值是一个哲学范畴。研究高等教育的价值,就是要从哲学的层面回答“高等教育有什么作用”的问题。对价值本身的界定,不同的哲学流派有着不同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3页)。价值是客体 and 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它“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因此价值具有客观社会性。同时价值又只有在主体的需要中才得以体现,因此价值不能脱离主体而存在。价值观,即价值取向,是主体对客体需要的关系在主体观念上的反映,也就是主体的价值判断。不同的主体,对客体需要的关系不同,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表现为不同的价值观。

研究高等教育的价值就是要研究作为主体的人及人的群体——社会对作为客体的高等教育的需要的关系。我国教育理论界所作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高等教育价值观展开的,即主要是探讨人们的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对高等教育实践的影响。而深刻分析高等教育的价值及其客观社会性的研究则很缺乏。虽然二者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探讨的角度则有不同。

有人把历史上存在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区分为“人本主义教育价值观”和“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前者主张教育的价值主要在于满足人的自身发展的需要;后者主张教育的价值主要在于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论者指出这两种教育价值观各自只强调了高等教育作用的一个方面而具有片面性,循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会使教育实践产生偏差;进而提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应建立社会发展需要和人自身发展需要相结合的辩证统一的教育价值观。

也有人从另一角度把历史上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区分为“个人本位教育价值观”、“社会本位教育价值观”及“知识本位教育价值观”。和前述划分不同的是这里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了高等教育在发展和创造知识方面的作用。

在关于高等教育价值观的研究中,不少论者都分析了不同教育价值取向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对纠正某些片面的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教育价值观是关于教育现象的最基本的观点,它决定对教育目的的认识,对教育方针的制定,对教育功能的选择和对教育活动的评。这就是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与高等教育价值观紧密联系,理论界探讨了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功能。

在关于高等教育目的的研究中,论者多是联系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批判了“个人本位目的观”和“社会本位目的观”的片面性,指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目的,既要促进人的发展,也要促进社会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关于高等教育功能的研究方面,论者指出高等教育功能和高等学校职能是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高等教育功能是指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育人功能”和其他“社会功能”,高等学校的职能是指高等学校作为一个具体的机构所具有的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研究指出,高等学校职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扩大的,但各项职能不是处于同一地位,培养人才应是最基本的职能。有的研究者还从其他角度(如知识的角度)探讨了高等学校的功能,这些研究都有助于拓宽人们的视野。

(三)关于高等教育和社会关系的研究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高等教育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子系统和环境超系统必然存在相互作用。一方面,高等教育要受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也要对社会产生能动的反作用,或促进、或阻碍社会的发展。研究高等教育和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是高等教育如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问题。

研究者从多方面探讨了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其中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问题成为理论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是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现实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就要求人们分析这种影响,寻求对策,趋利避害;要求从理论上予以说明,给实践以指导。已有的研究是从多角度、多侧面展开的,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观念的转变问题,教育体制的变革和适应问题,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教育结构的调整问题,人才培养的模式问题,教育运行机制问题等等,似未可尽述。总的说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处在发散研究阶段,涉及的问题多,提出的观点杂,而且多是从政策或操作的层面进行的论述,尚未深入到相对集中的理论层面。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事物,它本身还处在发展之中,我们对市场经济规律还缺乏深刻认识,因而必然影响到我们对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

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在研究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时,要认识到二者的质的区别。不能一般地提“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接轨”,不能在高等教育领域完全套用市场经济的规律,高等教育还要遵循自身的规律。

在研究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中,有的作者提出高等教育不能只是“适应”社会,还应该“导引”社会,也有作者提出高等教育要“超越”现实规定性,即产生了所谓“超越论”与“适应论”之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具理论价值的问题,我们期望这个讨论能够深入下去。

(四)关于高等教育的教育观的研究

教育教学工作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改革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改革的根本目的

是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出适应时代和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有正确的教育观来指导教育教学的实践。为此教育理论界围绕高等教育的教育观问题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高等教育应该培养怎样的人和如何培养的问题。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在教育教学上长期存在的专业面过窄,培养的学生知识面窄,缺乏创造性能力和深厚的文化素养,适应性不强等等问题,许多研究者提出应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教育目标,加强对综合素质的培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等观点。归纳起来,关于高等教育教育观的探讨可以归结为高等教育目标论、高等教育素质论、高等教育主体论。

关于高等教育的教育目标,我国一贯的指导思想是培养专门人才,着眼点在一个“专”字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过程都是为这个“专”字服务的。“专”强调得过了头,就自然产生了“窄”的问题。一些论者指出,根据新的时代特征,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既要有“做事”的本领,又要有“做人”的品格,要有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要善于学习,善于交往,富有创新精神。围绕这一主题,一些研究者还从理论上探讨教育目标的社会性、系统性、层次性等问题。

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的素质问题,一些研究者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只重视专业素质,而忽视意志品质和文化素质等的倾向,提出高等教育应加强对综合素质的培养,以素质教育代替专业教育观。围绕这一主题,在理论上探讨了素质的概念和内涵、素质的结构、素质教育的概念和实施方式、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的关系等。关于“素质教育”的问题,在高等教育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由此展开的争论对深化教育观的理论研究是有益的。

关于高等教育中学生主体性的问题,围绕这一主题所阐述的观点则是基本一致的。教育不应把学生当做知识的容器或塑造的对象,学生是教学过程中自我发展的主体。高等学校应该为学生创造和提供一个适于其自我发展的环境。

与教育途径相关,并构成我国教育方针的组成部分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也是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主题,有人对马克思提出这一原理的时代背景及其本质含义进行了研究,还探讨了在当前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对这一原理内涵的发展。其中一些观点,如关于“生产劳动”概念的扩大以及“结合点”的提出都是颇具新意的。

(五)关于高等教育的其他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

除了前面已经叙述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之外,本卷还收入了探讨高等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终身教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若干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反映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广度。但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无论是文章的数量还是研究的深入程度都不及前面提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具有理论价值,与高等教育实践也是密切相关的,因而应该成为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

在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一些学者还对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理论界分别提出了以高深学问、知识、教学活动、学生、专业……等作为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不同观点,但至今尚未出现以任何一个逻辑起点建构的完整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这一方面反映了关于高等教育现象的理论研究尚未达到体系化的成熟程度;另一方面,从方法论上来说,对于高等教育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内涵和外延的复杂系统,寻找单一的逻辑起点建构理论体系是否有效,也存在疑问。因而也有人提出采用公理化方法建立理论体系的构想。但不管用怎样的方法,笔者以为,问题研究应放在首位。体系的建立应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在深入的问题研究基础上才能水到渠成。

写了上面一些话,算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原理研究50年(严格说是近20年)作了一个简略的回顾,是否能反映真面目,未见得。要想了解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真实情况,最好的办法还是请读者自己去读那些已收集到的和未收集到的文章吧。

1999年3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高等学校与生产力(1979)	王 零 蒋学模 伍柏麟(11)
应该把教育看做生产部门(1980)	肖灼基(15)
关于高校有偿服务问题的几点意见(1988)	孟明义(16)
试论教育劳动产品的商品化(1988)	董相岩(19)
高等教育和生产力发展(1993)	王亚朴(23)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教育本质与 大学职能等问题(1995)	李卓宝(25)

* * * *

论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 一致性(1991)	余 立(30)
教育价值与教育方针(1992)	刘一凡(34)
市场经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 探析(1994)	李 放 王凤达(37)
大学的理想和市场经济(1994)	顾明远(41)

* * *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等教育的特点 与对策(1988)	黄家驹(44)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高等教育(1988)	成有信(47)
高等教育适应性的若干理论问题(1989)	冷余生(49)
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辨析(1989)	邢维龙等(52)

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理论讨论会综述(1993)	李志仁(54)
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系讨论之回顾(1993)	朱国仁(57)
大学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1995)	刘以恒(60)
论高等教育对社会的“适应” 与“导引”(1996)	龚 放(63)
论高等教育的超越(1997)	张晓洪 熊利明(67)

* * * *

重新认识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1982)	冯之浚等(70)
关于高等教育结构研究的一些 理论问题(1986)	陆有德 王音特(77)
试析现代高等学校的六项基本职能(1993)	徐 辉(79)
也谈高等教育的功能和高等学校的职能 ——兼与徐辉、邓耀彩商榷(1995)	邬大光 赵婷婷(81)
高等教育文化功能(1996)	潘懋元等(84)

* * * *

关于高等学校怎样贯彻执行全面发展 的教育方针问题(1955)	滕维藻(95)
略论高等学校的全面发展的教育 方针(1956)	蒋南翔(97)

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1982)

..... 方遇顺(101)

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学说的历史

考察(1984)

..... 王佩雄(104)

论大学生的个性发展(1990)

..... 李翰如 郑清奎 楼尚聪(107)

关于高等教育目标的理论思考(1990)

..... 周 川(111)

试论素质的含义及大学生的素质

结构(1991)

..... 徐世朴(115)

现代化与高等教育目标(1993)

..... 文辅相(118)

大学应当培养作为人的人而不是

制造工具(1995)

..... 孟明义(121)

我国本科教育目标应当作战略性调整

——“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系统和规格

的研究”课题研究报告摘要(1996)

..... 文辅相(123)

试论大学素质教育(1997)

..... 桑 放(126)

* * * *

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

和实践(1992)

..... 厉以贤(131)

产学合作教育及其在我国面临的问题(1992)

..... 樊恭杰(135)

试论中国特色的产学合作教育(1993)

..... 管庆智 陈锡章 王思敬(139)

* * * *

论学术自由及其形成之条件(1999)

..... 肖海涛(142)

* * * *

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均等:过去、现在

与未来(1995)

..... 余秀兰(146)

妇女地位提高与中国高等教育(1995)

..... 鲁 洁(150)

* * * *

论终身教育的现实意义(上)(1982)

..... 周蕴石 周南照(154)

论终身教育的现实意义(下)(1982)

..... 周蕴石 周南照(157)

高等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作用(1986)

..... 李亚玲(159)

论高等学校在未来终生教育体制中的

地位和作用(1997)

..... 梁 柱(161)

* * * *

国际化与民族化相结合:高等教育现代化

的必由之路(1996)

..... 史贵全(165)

高等教育现代化初探(1996)

..... 冒 荣(168)

* * * *

《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前言(1957)

..... 潘懋元(172)

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

——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1978)

..... 潘懋元(173)

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

——在全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

讨会上的报告(1983)

..... 潘懋元(178)

发展高等教育科学的几个问题(1983)

..... 汪永铨(182)

八十年代我国高教理论界争论的

几个重大问题(1991)

..... 薛天祥 唐玉光(185)

试论高等教育学的改造(1993)

..... 王伟廉(190)。

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活动

——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1997)

..... 薛天祥 尹 丽(192)

附录:

“高等教育原理”基本论文目录 (197)

“高等教育原理”著作目录 (227)

高等学校与生产力

王 零 蒋学模 伍柏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从今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正确和及时地实现高等学校工作重点的转移,首先必须完整准确地认识学校的性质及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地位 and 作用。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近代学校愈来愈成为一定阶级培养各种劳动力的机构,高等学校则成为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的主要场所。在我国的整个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高等学校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承担着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双重任务。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四个现代化,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能实现;现代化的人才,有赖现代化的教育去培养。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现代化教育,就不会有四个现代化;只有办好我国的高等学校,才会有我国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一、学校是社会分工中培养各种人才的部门

人们要生存,就要从事物质资料生产。表明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能力大小的社会生产力是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必须一点一滴积累,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不断发展和进步。其中,人们的劳动技能、劳动经验和各种生产知识依靠教育传给下一代。由于生产力在发展,劳动的种类日益增加,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教育也显得愈来愈重要。

学校成为积累传授生产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部门,是在人类社会的一个很长历史时期内发展起来的。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中,教育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的,没有独立的学校和专业的教育人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里,各种物质资料的生产都采取手工劳动和个体生产的形式,生产技术仍比较简单,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儿童从小直接参加家庭的生产劳动,并从劳动中直接承袭到父辈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如果要从事比较复杂的劳动,如某些手工业劳动,则采取拜师学艺的办法接受教育和训练。在奴隶

社会和封建社会,教育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部门。但是最初的教育部门,不论是官办的,还是私人的,都不是传授生产知识,培养劳动力,而是传授法制、历史、军事及一般文化知识,为统治阶级培养管理人才。《周礼》中讲,“养国子之道,教之以六艺”,那六艺乃是礼、乐、射、御、书、数。孔丘办私塾,教的大体也是这六艺。“六艺于治一也”,目的都是为了学习维持剥削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本领。

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使学校的职能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学校已不仅是培养资产阶级维持阶级统治所需要的政治、法律、经济等管理人才的地方,而且也成为培养和训练“伶俐的工人”的场所。“现在资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个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①机器,是物化的智力。工人要用机器去劳动,本身不能没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不能不预先受点学校教育。马克思说:“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②这里说到的“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当然是相对于“不发达的、普通的劳动力”而言的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因为,教育和训练劳动力的要求及其费用,是随劳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③。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一般说来,那时一个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只要受过初等教育也就能适应了。但在今天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条件下,生产开始出现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全盘自动化过程,现代化的机器体系对工人的科学文化知识要求愈来愈高。工人不仅要掌握生产技能,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相当高的技术理论知识。操纵自动化作业线的工人必须懂得每个操作过程,每台机床的结构和整个工艺过程。现代化工厂不仅需要具有较多科学技术知识的工人,而且还要求有高深科学理论和技术知识的专门研究人才。工程师、研究员、技术人员在职工人数中的比重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农业生产也正在经历巨变。做一个现代化的农民很不简单,除了需要一般的基础知识外,还要有各种农业的专业知识。因此,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劳动人民子弟的在校年限延长和教育费用增加的趋势,高中毕业已成为劳动就业最起码的学历条件。这就是说,在现代化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中等教育也只能培养出普通的简单劳动力了,只有高等教育才能担负培养专门的复杂劳动力的任务。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④。这是不是意味着学校不再培养劳动者和各种专门人才,或者这方面的任务有所削弱呢?“四人帮”曾别有用心地叫嚷要把高等学校统统办成什么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这种谬论,即使在“四人帮”控制着全国主要舆论工具的时候,也被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视为奇谈怪论。以现代化大生产和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理所当然要使教育更加适合生产发展的需要,越来越成为培养各类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部门。恩格斯晚年时曾在一封《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说:“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⑤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大学既要培养掌握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也要培养能掌握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理、工、农、医等方面的专门人才。无论哪一种专门人才的培养,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传授,都要为保护和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个中心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20年,列宁在拟定了国家电气化计划之后随即表示“学校教育和教学工作的性质,以及社会教育的性质都应当改变”,要围绕电气化计划这个中心“来开展我们的教学工作和训练工作”^⑥,并说“我们一定会获得科学和技能:如果没有实际本领,任何学校、任何大学都是一钱不值的”^⑦。我国30年来教育实践的经验也同样证明了:如果只是片面地把学校当做搞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地方,尽喊些“响亮的词句”,不把“丰富的知识”、“科学和技能”传授给学生,学校就一定会落到“一钱不值”的地步。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学校是社会分工中培养劳动者的部门。现代学校的这一性质也就表明,办学校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带有生产性消费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和消费是对立的统一,具有同一性。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是包括物质资料和劳动力的两种生产、两种消费的过程。为了进行生产,不仅要具备一定数量、质量、品种合格的各种生产资料,也要具备一定数量、质量、品种合格的劳动力。大家都知道,生产产品时生产资料的耗费是生产性消费,这就必须承认,生产劳动力时的各种耗费也是生产性消费。它不只包括维持劳动者本身及其家庭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消费,同样包括教育所

需的物质资料的消费。马克思指出,因劳动复杂程度不同而不等的教育费,“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⑧。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已不再是商品,因而不存在劳动力的价值这个概念,但为培养劳动者所支付的教育经费对于发展生产力是十分重要的,那种把教育看做消费事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学校虽与工厂企业不同,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单位,却是培养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即各种劳动力的机构;我们的人民教师,不但应享有“灵魂工程师”的崇高称号,同时又是培养各种劳动力的“工程师”。

应当肯定,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和规模的确定,教育经费的增拨,要取决于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但同时,教育事业的发展,又是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生产力中机器等等物的因素,总是由劳动者创造、使用和改进的。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力,适应面广,适应力强,劳动熟练程度提高快,容易接受新技术并成为新的技术变革的原动力;因此,从人的因素看,教育已越来越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当代的资产阶级及其学者十分重视教育,甚至称它是“最有利的投资部门”。资本主义的大公司自己开办各种学校,训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课程常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改变,每当出现一种新技术,马上开设新课程或训练班。企业把支付工人的学费作为生产费用列入产品成本。照他们的看法,如果没有对“人的投资”(指教育),对“物的投资”(指增加新技术装备)再多再好,也不能发挥作用。目前,以计算教育投资效果为对象的“教育经济学”日益成为西方的一个热门学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虽然不再以保证利润为目的,但教育投资的效果也必须而且可以计算。经验证明,从我国解放时起到文化大革命为止,我国高等学校为国家培养了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的专门人才。这些毕业生的大多数,现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对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正起着重大作用。

二、高等学校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基地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高等学校与生产力的密切联系,还表现在高等学校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加速科学发展,加快科学应用于生产的过程中,高等学校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在西欧、北美各国和日本,大学的科研机构 and 科研经费迅速增加,实验设备不断更新,科研成果显著,出了不少著名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社会在有计划地加速科学发展时,同样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作用。这是因为,高等学校和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各有自己具体的特殊条件,开展科学研究可谓各有所长。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长处,可以使高等学校不仅

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的基地,而且也成为基础科学和新兴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

首先,科学研究一方面需要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另一方面又以对前人成果的利用为条件;而高等学校不论在利用前人的成果或开展今人的协作方面,都有自己的有利条件。高等学校有较好的图书资料设备,荟萃着古今中外的科学文化知识,便于利用前人知识和外国经验。高等学校里既有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又有一批经过教学工作锻炼和具备一定科学研究能力的中年、青年教师,还有人数众多、思想活跃、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少、敢于发明和创新、勇于实践和探索的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这就有利于组成一支在老专家领导和指导下向科学攻坚的梯队,使科学研究中的各种力量能够更好地互相配合和发挥作用。例如,复旦大学数学系逐步形成一个以我国著名数学家、校长苏步青和已故的陈建功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老中青结合的、既有“指挥官”又有“突击队”的科学研究攻坚队伍,20多年来,共发表论文470多篇,取得了可喜的科学研究成果。

其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学科领域之间互相渗透。一方面,学科愈分愈细,愈分愈多;另一方面,重要的科学研究领域和课题更带有综合性,必须经由许多学科研究人员的共同协作和努力,才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大学是一个由许多不同学科组成的综合体,特别是综合大学,具有学科多、专业多因而综合性强的特点。因此,新的学科分支、边缘科学、综合性很强的新兴科学最易在大学突破和发展。复旦大学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数学系教师和化学系教师合作,迅速开展了量子化学的研究;物理系教师和数学系教师合作,在规范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在化学系教师和物理系教师的协作下,电光源研究迅速发展;依靠物理系教师和数学系教师的共同努力,很快建立了计算机科学系。同时,全校有各种跨系科的学术讨论班,开展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推动综合性的研究工作。

第三,科学实验是人们认识外界现象的一种重要方法。从一些发达的国家看,高等学校大都拥有本门学科中设备比较先进和齐全的实验室,有些国家把最先进的计算机、反应堆等科学实验设备安排在大学里,使它们成为全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心。高等学校的实验室和先进的实验设备,不仅可以为科学教育工作服务,而且可以用来进行科学研究,一举两得。近年来,复旦大学化学系自行设计了一些实验设备,这些设备不仅初步满足了现代化教育的需要,并且用于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化学研究的成果。

最后,大学里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起着互相促进的作用。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向学生系统传授本门学科的知识,科学研究则是探索本门学科及有关边缘学科的新知识。从一定意义上说,两者是科学工作中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高等学校教师,只有从事科学研究,不断探索和掌握最新科学成就并把它及时反映到教学中去,才能不断

提高教学质量。反之,教师从事教学工作,既要使学生听懂,又要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教学上的需要,往往会触发新的科学思想,引出科学上的突破。门捷列夫从事化学教学工作的需要,是促使他发现元素周期律的一个重要因素。高等学校把教学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既能使科学人才辈出,又能使科研硕果累累,加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把高等学校办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是完全符合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性的。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它所传授和研究的基础理论,属于“知识底形态上”^⑨的生产力,“一般社会生产力”^⑩。科学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以直接的或间接的、眼前的和长远的、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同形式促进生产的发展。基础理论的每一项研究虽不一定都能直接或立即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应用于生产,但从总体来说,它是提高整个科学水平,提高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水平的基础。近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历史表明,每当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出现新的重大突破时,或早或迟会反映到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上,引出许多新的科学技术领域,推动原有各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达到新的更高水平,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的突飞猛进。基础理论研究的这种深远意义和影响必须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否则就可能出现科学发展中的战略方向错误。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新兴科学技术研究。这种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成为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直接用于生产实践,并入生产过程。马克思把这种情形叫做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⑪。这一类研究工作,实际上是生产过程的先行阶段,是生产总过程的一部分。从事这种科学研究的劳动,同样是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为这种研究所支付的费用,例如实验场所的建立,实验设备的添置和更新,实验材料的消耗等等,也都是生产费用,与工厂企业内生产物质产品所支付的费用,没有什么质的区别。社会主义企业在应用学校科研成果时,应该如同向其他企业购买原材料和机器设备一样,支付相应的代价和报酬,承认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使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的经济作用”,从高等学校同社会主义企业的关系上体现出来。

文化大革命前夕,高教部曾在北京举办过直属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展览会。会上展出的,有农业科学技术、工业科学技术、新兴科学技术和基础理论研究等各种科研成果。中央领导同志在参观后指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很值得提倡。高等学校的科研成果一般是花钱不多,成效很大。20多年来复旦大学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半导体、电光源等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方面的研究,具体地体现了这一特点。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多来,这些方面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又不断涌现。这些成果的经济价值,比支出的研究费用不知要大多少倍。

以上讲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系科同四个现代化的关系。像复旦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除了自然科学系科以外,还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系科和研究机构。它们所培养的人才虽然大部分并不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但同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建立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时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⑫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工人阶级自己的队伍中,就必须既有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也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大学理工科和文科、艺术院校,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任何重理轻文或重文轻理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三、办好高等学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建国以来到 1966 年上半年的 17 年中,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的指引下,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复旦大学同其他兄弟院校一起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大量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并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在若干重要科学技术领域中形成了攻坚队伍,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缩短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文化大革命以来的 11 年,高等教育战线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特别是,由于这 11 年来青年教师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中年教师没有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经受过锻炼和提高,老年教师除了一部分已被迫害致死外,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的作用而不能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发挥作用,这样就出现了教学和科学研究人员青黄不接的严重情况。

粉碎了“四人帮”,复旦大学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就为把学校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方面创造了条件。

当然,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和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我们面前的困难是不小的。就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来讲,现在的教室和实验室设备陈旧,数量不足,不能适应现代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需要,这是高等学校中相当普遍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可能的条件下从国外购买一些先进设备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任务重,要搞现代化,主要还是应当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前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努力工作,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加强实验室和图书资料的建设,逐步充实和更新试验手段,积极开展教学和研究

工作,少花钱,多办事。

搞教学和科学研究,物质条件是重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仍然是人,不充分调动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再好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也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取得好的成果。而充分调动了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就有可能利用 60 年代甚至 50 年代的设备,取得 70 年代水平的科学成果。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全面贯彻、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有关方针政策,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还要花极大的气力从各方面创造条件来提高教师的科学水平。要建立健全教学人员考核和晋级制度。要发扬学术民主,活跃研究空气,提倡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的自由探讨。同时,要大力整顿教学、科研秩序,以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

毛泽东同志曾一再指示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周恩来同志也曾明确指示:“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讲‘成本’”^⑬。目前高等学校中人力、物力、财力没有得到合理利用的现象相当严重。复旦大学和其他很多高等学校现在培养一个大学生所需的费用,比文化大革命前高得多。这说明,高等学校挖掘潜力是大有可为的。如果经过高等学校本身的努力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使学校各项工作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好水平,那么就肯定可以用较少的经费培养出更多的专门人才,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所以,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对于高等学校也是适用的。学校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还需要从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继续进行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的整顿,以便在两三年内治好创伤,恢复元气,为进一步有效地发展和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

①②③④《资本论》第 1 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424、195、567、195 页。

④《俄共(布)党纲草案》,见《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746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487 页。

⑥《在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344、346 页。

⑦《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见《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417 页。

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 3 分册,第 358 页,人民出版社,1963。

⑨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422 页。

⑩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 206 页,人民出版社,1978。

⑪《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62 页。

⑫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 年 6 月 19 日。